

佛典题记中的高频词“出”与经典的生成

林旭娜

摘要：多义词“出”在佛典题记中是一个高频常用词，在东汉至六朝时期的题记中主要用于表达佛经的产生，迨及隋唐和宋代，此类用法以及“出”的总体使用频率都大幅度减少，转而使用“译”“译成”。总体而言，“出”并不表示翻译，而强调经典的生成。对比中土文献典籍著录的传统，“出”的使用一般与经典的出现有关，而六朝时期佛典题记频繁使用“出”，既有佛教叙述传统的影响，也是撰者有意为之，以实现为佛经的生产赋予崇高神圣色彩的目的。随着此后政治环境的变化，“出”的使用也渐渐衰落。

关键词：佛典题记 出 语义 经典生成 语境

一、引言

1. 佛典题记及其语言特点

所谓佛典题记，指的是佛典的序、跋、后记等材料，它们记录了佛典的来源、翻译和编纂情况，是了解佛典产生和流传的一手材料，其内容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宗派人物的关联，在佛教史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同时期的佛典题记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六朝时期，佛典题记主要为佛经翻译的记录，叙述了佛经的梵本来源，译经目的、意义、过程、时间、地点、参与人物及其分工等情况，是研究佛经翻译活动最为珍贵的原始材料。隋唐时期，译经相关的题记不再占据主要地位，而涌现了大量的经疏序，其内容囊括了诸多佛教义理方面的议题。迨至宋代，出

现了许多类书和史传类作品如灯录，题记的内容反映了文人、佛教徒之间的交往和宗派思想，与前代又有不同。佛典题记一般附于佛典文本之前或之后，早期题记的撰写者可能是参与翻译的僧人、佛教徒；也可能是六朝时期的一些君主、文人，他们虽未参与翻译过程，却是译经活动的赞助人、支持者；还有可能是编纂经录^①的僧人，其在编纂经录的过程中撰写了对某些佛经的整体翻译情况和内容的介绍，例如《出三藏记集》中收录了道安多篇经序，或为道安编《综理众经目录》时所写。隋唐五代的题记撰写者有许多是汉传佛教的大师，而宋代的题记有许多为文人所撰，这些文人不一定是佛教徒，只是与某些僧人有过来往。

在这些题记中，“出”字的使用频率之高、意义之丰富令人惊讶，既可作为主要动词单独使用，如“出经”“出三藏”“口授出之”，也可与其他动作动词一起构成动补结构，如“诵出”“宣出”等。出现复杂繁多的用例，与“出”的本义有关，与佛典题记的属性有关，也与佛经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有关。对“出”之含义的考辨有利于确定佛经译场中人物身份，考察译场的组织模式和译经程序，确定佛典翻译时间及其流传路径。“出”的使用还受到佛教的叙事传统、汉地的典籍著录方式以及题记撰者的写作目的等因素的制约，恰是一个探讨佛教中国化和经典生成过程的绝佳窗口。

以往对佛经题记的关注大多着重于出土佛经的题记，而针对现存大藏经的佛经题记的研究较少，或是将其作为佐证史料，对现存题记进行汇编，如许明所编《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②，而不对题记的撰

① 经录即佛教经籍目录。自汉译佛经产生之后，到六朝时期翻译活动发展繁荣，东汉至宋代之间大量的佛典被译出，但由于战乱和一些社会历史因素，许多佛经散佚，从六朝开始涌现了一批对汉地翻译佛经名录的搜集整理的目录书——经录，现存最早的经录为南朝梁释僧祐所撰的《出三藏记集》，其题名中的“出”即为产生、出现之意，“三藏”则指经、律、论三藏。《出三藏记集》卷六至卷十二为“总经序”，这部分内容继承了失传的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中的经序，其中有许多佛经至今已无存，只有经序部分在经录中保存。

② 许明编：《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写者、叙述方式和语言特点进行专门的考察。本文关注的常用词“出”在魏晋南北朝的译经题记中使用极其频繁，并且随着时代的演变，“出”在隋唐和宋代的使用频率大大降低。对“出”的考察可发现佛经翻译活动随时代的变迁以及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如何随着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的演变而发生的变化。

本文拟梳理佛典题记中“出”的含义及其演变，探讨影响“出”的使用的因素，以此作为了解佛经翻译过程的一个角度，观察翻译活动中文本流传与语言转换的一些细节。文章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佛典题记的性质，并梳理以往对“出”字含义的讨论。第二部分对东汉至宋代佛典题记中“出”的使用做全面的考察，分别分析“出”作为主要动词和动补结构的补语的用例，试图归纳“出”的核心语义。第三部分则是简单考察中文献对典籍的著录方式，以及印度原典对于文本生产方式的表述，探求佛典题记中“出”高频使用的原因。第四部分为结论，总结从“出”字的使用反映的佛典翻译过程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文化思想史。

2. 对于“出”字的讨论

在佛典题记中，“出”字是频繁出现却又语义模糊的一个词。早期主流观点大多认为“出”的意义等同于“翻译”，如Arthur Link认为“出”指翻译产生文本这一活动^①。Arthur Waley认为“出”和“译”相对，“出”指口译，而“译”指笔译。^②但也有学者认为，“出”不等于翻译，Richard Robinson认为“出”是印度语言母本的诵读，而非口译或笔译^③。Boucher则强调“出”代表了诵读原典加上从源语转换为汉语

① Link, A. E., & Seng-Yu, S. (1960). Shih Seng-Yu and His Writing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0(1), pp.17–43.

② Waley, A. (1957). Review of Chōronkenkyū.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1), pp.195–196.

③ Robinson, R. (1967). *Early Madhyamaka in India and Chi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298.

的过程,远非“翻译”可概括。^①

在佛教早期最重要的经录《出三藏记集》中,与佛典的翻译有关的“出”的含义有五种:译出、撰出、抄出、宣出或诵出、演出。^②陈金华考察了《出三藏记集》中与翻译有关的“出”的含义,指出“出”至少有以下几种含义:(1)口诵胡本;(2)口译胡本;(3)在口诵胡本基础上的初译本;(4)译经过程的完结(包括口译和誊抄、润文、证义和校勘等一系列程序)。他发现“出”往往与翻译起始时间搭配,认为“出”的核心含义为翻译之始。^③张雪松考察了道安经录中“更出”的使用,认为“更出”指的是“在旧有译本的基础上修订或新译,而且修订者或新译者,与之前的译者绝非同一个人”^④。然而,“出”的含义远不止此。《出三藏记集》卷七《首楞严经后记》(未详作者)提到:“咸安三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⑤这里,“张天锡”并不是译经人,而是译场的组织者,“出”的含义也有待探究,可以是张天锡得到一个《首楞严经》胡语本而宣示众人组织翻译,或者是他作为世俗政权对《首楞严经》的承认并将翻译完成的佛典公开,又或者还有其他含义。王向远注意到魏晋南北朝的经序中频繁使用“出经”一词,并认为“出经”中的“出”至少有几种含义:(1)指示经之来源,即经出之处,一般是印度或西域;(2)指“首出”,即指佛经在汉土、秦地首次出现,并被首次转换为汉语文本;(3)指出经者,一般是翻译活动的策划人和主持人,不一定是译者;(4)意义大约等同于“翻”或“翻译”;

① Boucher, D. J. (1996). Buddhist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Dharmaraks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② 参见饶宗颐《论僧祐》,《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年第6期。

③ 参见陈金华《早期佛典翻译程序管窥——以〈出三藏记集〉中一长期被误读之关键词为例》,《佛教与中外交流》,杨增等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

④ 张雪松:《中国佛教早期译经中的“更出”问题探析》,《国学学刊》2020年第3期,第25页。

⑤ [南朝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1页。

(5) 指示“出经”的请求方或委托人、赞助人。^①上述讨论均注意到“出”作为高频词在语义上颇为复杂,并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讨论,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以往研究一方面集中在与翻译程序有关的“出”的义项,没有涵盖“出”的所有义项,单纯将“出”视为动词,而实际上“出”也可能作为述补结构的一部分表结果义,在讨论“出”的含义时也较少与佛典题记中意义相近的其他动词比较,遑论与中土文献中“出”的含义比较。另一方面,以往对“出”的讨论忽略了佛典题记的属性,没有进一步给出“出”何以多义以及高频使用的原因。本文认为“出”表示经典的产生和来源,而翻译的含义是由语境赋予的,并非其本义。汉魏六朝佛典题记中“出”的高频使用受到了中土撰述传统和佛教叙事模式的影响,并在随后的时代中,由于佛教地位的变化,“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其他词代替。

二、佛典题记中“出”的含义

本文考察东汉至宋代佛典题记中“出”的使用情况,统计不同时期“出”的用例和“出”的不同搭配,尽可能地搜集和分析所有与译经或“经典”^②产生有关的“出”的含义,以展现“出”的使用与译经之间的关联。本文主要使用的文本为东汉至宋代的佛典题记,参考佛经序、跋、题记的汇编——《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中自东汉至宋部分的编目,在CBETA相应题记的内容中进行检索。另外,参考历代

① 参见王向远《佛典汉译“出经”及其概念功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1卷2022年第4期。

② 在汉传佛教的语境中,对“经典”的判断随时代而不同。在佛教初传时期,经典一般指汉译佛经,这一类经典的原典来源为西域胡本或印度语言的佛经,而中土撰述有的不受重视,有的被视为疑伪经(僧祐用“疑经伪撰”形容),在经录中列于“别生”“疑惑”类目下而被摒弃。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汉地的佛教大师所作的注疏、义解渐渐也可成为经典,如《法华玄义》,这一类会出现在官方编定的入藏录中,在汉文大藏经中有一席之地,并且此类著作的完成有时也使用“出”来表达,本文的分析将这些“出”的使用也算在内,详下。

佛教经录如《出三藏记集》《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贞元录》《大中祥符法宝录》和《景祐新修法宝录》中的部分内容如经名、译经提要、对译场情况的介绍等，以及梵汉对照辞书、字书中与“出”相关的条目，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考察“出”的含义。此外，对比中土序跋《文选序》和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对作品的著录方式，在比较中明晰“出”在佛典题记这个特殊语境中的特殊用法。

本文对“出”的考察分为以下几方面：首先，统计佛典题记中“出”的所有用例，进而对不同用例进行分类。其次，集中分析“与‘经典’的诞生有关”这一类别，再划分两个次类：作为主要动词与作为动补结构中的补语。同时，列出题记中表达与“出”相近的含义的其他动词并进行对比，考察“出”或与“出”含义类似的动词在佛典题记和中国传统文献如类书中是否使用、使用语境等情况，探究“出”的使用规律。

1. 东汉迄宋佛典题记中“出”的使用概况

根据统计，自东汉至宋代佛典题记的数量有所变化，而“出”的使用也随时代的不同有一定差异，使用的具体语境也有略微的差异，请看表1：

表1 东汉至宋代佛典题记中“出”的使用统计

	佛典题记 / 篇	“出” / 例			“出”的平均频数 (次 / 篇)
		与“经典”的诞生有关	其他	总计	
东汉至六朝	134	231 (64%)	132 (36%)	363	2.71
隋唐五代	109	52 (27%)	144 (73%)	196	1.80
宋	264	82 (19%)	339 (81%)	421	1.59
合计	507	365 (37%)	615 (63%)	980	1.93

参考汇编资料，本文搜集到的佛典题记共507篇，其中东汉至六朝的题记共134篇，隋唐五代有109篇，而宋代有264篇，数量最多。至于题记的内容，汉魏六朝的题记多为与译经有关的题记，叙述佛经的来源、译经缘起、译经的时间、地点、参与人等，篇幅一般较短。迄至隋唐时期，有小部分题记仍是译经相关的题记，但对于经本如何得到、译经过程的交代较略，只提及译经人，并且出现了许多疏、引、释、论等的序言后记，如智顗《梵网经菩萨心地品戒疏序》、法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后记》、慧沼《因明入正理论义断引》等，数量比译经题记多得多。迨及宋代，题记数量超过前两个时期的综合，并且题记的撰写者多为士人，所题文本除经和经疏之外，有许多属于史传和事汇部类的作品，如杨亿《景德传灯录序》、王随《释氏要览后序》、周敦义《翻译名义序》和赞宁《宋高僧传序》等。总的来说，从东汉至六朝，题记的篇幅总体逐渐变长，并且内容也发生较大变化，“出”在各时代的使用也有显著的差异。以下为根据表1所绘的东汉至宋“出”总体使用频次（图1）和“出”平均使用频次趋势及“出”的义项相对比例（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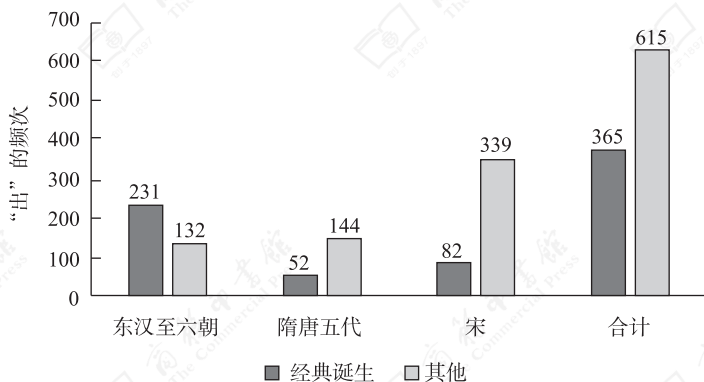


图1 东汉至宋“出”的使用频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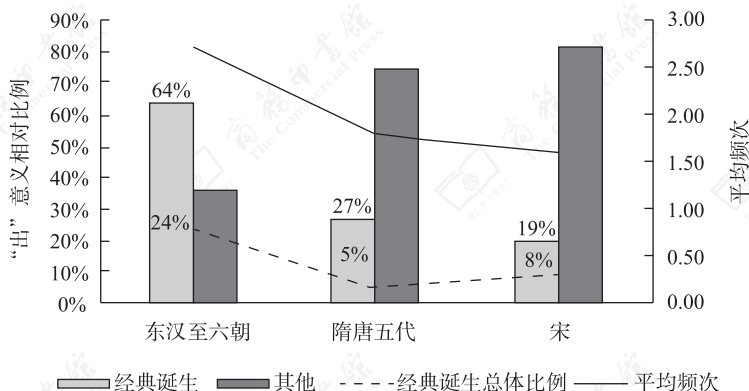


图2 “出”的平均使用频次趋势及“出”的义项相对比例

在这些题记中，各种含义的“出”总共出现980次，平均每篇出现1.93次，由此判断“出”属于高频词汇。随着时代的变化，“出”的平均使用次数逐渐下降，从汉魏六朝的2.71次/篇，到隋唐时期的1.80次/篇，再到宋代的1.59次/篇。从分类统计的比例还可发现，不仅“出”的总体使用频次逐渐下降，“出”与“经典”诞生有关含义的使用也是逐渐下降的，从六朝时期到隋唐相对比例下降最为剧烈，从64%下降到27%，而从隋唐到宋代只减少了8%，在所有980次使用中，“经典”诞生义所占的比例在六朝时为24%，到隋唐时降为5%，到宋代时略有提升，为8%，所有时期总比例和为37%。总体上“出”的其他义项使用比例更大，为63%。“出”的使用为何发生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反映了怎样的现实？“出”在具体的语境中又是如何被使用的？以下两节将给出探索性的回答。

“出”作为常用词，既可作为主要动词单独使用，可也与其他动词组合形成“复合动词”或连动结构，如“演出”“讲出”等。佛典题记中还出现了与“出”含义相近的“翻”“译”等动词，与“出”的使用形成互补，以下分别分析“出”用于表达与经典诞生相关的各种用法。

2. 作为主要动词之“出”

《说文》对“出”的释义为：“出，进也。象草木益滋上出达也。凡出之属皆从出。”“出”的本义是表运动的趋向动词，在先秦两汉时期已有多个引申义，《辞源》中“出”字条列出了十二个义项，前十个义项均于先秦文献中出现：一、由内而外，与“入”相对；二、拿出；三、产生，发生；四、出现，显露；五、超过；六、离开，逃离；七、出生，出身；八、出仕；九、遗弃，弃逐；十、古代男子称自己的外甥；十一、花瓣；十二、一个段落。^①在佛典题记中，排除表1中的“其他”类，“出”作为主要动词的词义主要涵盖上述第三、第四条。与“出”搭配最多的是“经”或佛经题名，或指代佛典的代词“之”，如：

（1）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

（2）出此经后至弘始九年闰月五日，重求检校。（僧叡《关中出禅经序》）

（3）秦弘始八年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慧观《法华宗要序》）

（4）经出之后，披寻反复，既悟深旨，仰而叹曰……（道慈《胜鬘经序》）

（5）渴仰情久，即于其夏出《阿毗昙抄》四卷，其冬出《四阿含抄》四卷。（道安《鼻奈耶序》）

（6）送诣仓垣，出为《放光品》，斥重省删，务令婉便。（道安《道行般若经序》）

（7）又其伴闾宾鼻奈，厥名耶舍，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道安《鼻奈耶序》）

^① 参见何久盈、王宁、董琨主编《辞源》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50—451页。原文附例句，此从略。

例（1）至例（3）“出”的宾语为“经”，“经”可能是泛指，如例（1）中泛指支越所译诸经，也可能是特指，如例（2）（3）中分别指《关中出禅经》《妙法莲华经》，特指的“经”前面可加指代词“此”“斯”等。“经”也可作为“出”的主语，如例（4），此时“经”多为特指，如《胜鬘经》。例（5）和例（6）中，“出”之后接佛经题名，例（7）中“出”之后接指代词“之”，都是指称具体的某一部佛经。在上述例子中，“出”并不一定指翻译的开始，也不能单纯理解为翻译，而更倾向于表达佛经的产生、出现或者面世。例（7）中的“出”也许可以理解为翻译，道安于此句之后写道：

（8）佛提梵书，佛念为译，昙景笔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为四卷。（道安《鼻奈耶序》）

这里提到了译经的整个程序和分工，并且也有一个“出”字被时间状语修饰，此时“出”的意义即符合陈金华所提的“翻译之始”。另外两例似也可理解为翻译：

（9）敦煌菩萨支法护，手执胡经，口出《首楞严三昧》，聂承远笔受。（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

（10）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道安《比丘大戒序》）

然而，在这些例子中，“出”与翻译相近的含义实际是语境赋予的，它更重要的意义其实是表达汉译佛典的诞生。佛经翻译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语言的转换，从胡语或梵语译为汉语，但从汉译佛经的文本本身来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因此，在例（8）中，译经的分工有“梵书”“译”“笔受”，这些都参与汉译佛经的生产，都是“出”的组成部分。“出”可以有翻译之义，但绝不限于翻译，此例

“译”与“出”兼用已可说明这一点。^①“出”的另外两种用法也不可理解为翻译：

(11)《三法度经》者，盖出《四阿含》。(慧远《三法度经序》)

(12)此经出《金刚大道场经》，大明呪藏分之少分也。(元楷《佛说陀罗尼集经翻译序》)

(13)咸安三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佚名《首楞严经后记》)

例(11)和例(12)中“出”表达的是佛经的节本、选本出自于全本，阐明文本之间的关联关系，而与翻译无关。例(13)中，张天锡为译场的赞助人，而非译经人，“出”的使用只表明《首楞严经》的由来。“出”表明佛经来源的意义也常用于原典产生、发现的地点，如：

(14)然斯经梵本，出自维耶离。在昔汉兴，始流兹土。(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

(15)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僧祐《出三藏记集序》)

例(14)“出”指明了《维摩诘经》产生的地点为维耶离，例(15)中僧祐用“出”来表达他对佛经起源的认知。除了所译佛经、原典来处，“出”还与译经的时间、地点和译经人等搭配，例如：

(16)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岁在甲申夏出，至来年春乃讫，为四十一卷，分为上下部。(道安《增一阿含经序》)

(17)然方言殊韵，难以曲尽，倘或失当，俟之来贤，幸诸明

^①《出三藏记集》的“铨名录”中，僧祐对于已翻译的佛经异本用了“异出”，而对于失去译人、译名的佛经则用“失译”一词，足见其对“出”与“译”的理解是不同的。

哲，正其大谬，晋太元十六年出。（慧远《阿毗云心序》）

（18）昔释法师于长安出《中阿含》《增壹》《阿毗昙》《广说》《僧伽罗叉》《阿毗昙心》《婆须蜜》《三法度》《二众从解脱》《从解脱缘》，此诸经律，凡百余万言，并违本失旨，名不当实，依佛属辞，句味亦差，良由译人造次，未善晋言，故使尔耳。（道慈《后出中阿含经记》）

（19）以弘始十二年岁次上章阇茂，请罽宾三藏沙门佛陀耶舍出律藏一分四十五卷，十四年讫。（僧肇《长阿含经序》）

（20）今之小品阿闍赏屯真般舟。悉讖所出也。（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

（21）于时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于晋有法护叔兰。……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

修饰“出”的时间状语，可以是具体的某一日，如例（8）；也可以是年份，此年份可能是佛经开始翻译的年份，也可能是翻译完成的年份，如例（16）和例（17）。例中动词“出”之前的地点状语为译经地“长安”，例（18）和例（19）中“出”的主语为译经僧，身份一般为通晓外语、充任译场中主译人的外国僧人。例（20）和例（21）中的“译经僧+所+出”句式比较常见，修饰译经僧已经译出的特定佛经。凡受“所出”修饰的均为早已翻译完毕的佛经，如以下两例：

（22）以汉末沸乱，南度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卷。（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

（23）此土先所出戒，差互不同，每以为惑。（竺佛念《四分律序》）

两例均叙述此前已翻译的佛经、戒律。在汉魏六朝时期，佛典题记中没有发现“出”与佛经之外文本关联的例子。到隋唐和宋代，“出”的

宾语就不限于佛经，可以是义疏、疏略或语录等：

(24) 兼出义疏三卷玄义两卷。(李伊《金刚般若经集注序》)

(25) 持此心经数千万遍，心游妙义口诵灵文——再三殷勤，令出略疏，辄以蠡管诂测高深云尔。(法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后记》)

(26) 今兹疏文，即隋炀帝请天台大师出之，用为心要，敕文具在《国清百录》，因令侍者随录奏闻。(湛然《维摩经略疏序》)

(27) 徐出《丛林盛事》一编。皆命世宗师与贤士大夫酬酢更唱之语。(宗演《丛林盛事跋》)

例(24)至例(26)中“出”的结果均指汉传佛教僧人所撰写的注解，例(27)中《丛林盛事》属语录一类，为汉传佛教独特的一类文体。以上几例“出”都不涉及翻译，含义更近于撰写、创作、编纂，究其核心义仍然在于某部作品的问世。这种叙述方式和“出”的使用，无疑是继承前代“出经”的表述方式，同时又通过作品与佛经的类比表达，实现使作品经典化的目的。

“出”单用时还可被各类副词修饰，如“新出”“更出”“重出”，表面上看与下一小节的“讲出”“诵出”等类似，而结构不同。这一类表达源于佛经翻译作为一种时间跨度大、持续性、参与人物众多的文化交流活动。

(28) 自兹以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僧祐《出三藏记集序》)

(29) 或晋宋近出，忽而未详。(僧祐《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序》)

(30) 或同是一经，而先后异出，新旧舛驳，卷数参差。(僧祐《出三藏记集名录序》)

(31) 斯土前出诸经班班，有其中者，今为二阿含，各为新录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见经寻之差易也。(支遁《大小品对比要抄序》)

(32) 朕虔思付嘱，情切绍隆，以久视元年，岁次庚子，林钟纪律，炎帝司辰，于时避暑箕峰，观风颍水，三阳宫内，重出斯经，讨三本之要詮，成七卷之了教。(武则天《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

(33) 于是，和乃追恨先失，即从提和更出《阿毗昙》及《广说》也。(道慈《中阿含经序》)

(34) 此经于先出《阿毗昙》，虽文言融通，而旨格各异。(道标《舍利弗阿毗昙论序》)

佛经翻译迄自汉末，迨及宋代，持续不断，渐成规模，佛经“近出”“间出”，在僧祐所处的时代是一种常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同一部佛经被不同人或同一人重复翻译，时人也意识到这种情况，叙述时自然使用“异出”“前出”这些表达。汉译佛经存在许多同经异译的文本，提及时便需要指明该经为何种版本，便有“重出”“更出”“先出”等用法。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前文张雪松的观点所示，“更出”“重出”有时并非从一个梵本译为汉本，而是对已存在的汉译佛经进行润色整理形成一个新的本子，因此这一类表达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其含义。“新出”少见于题记，但常常用于佛经题名，在经录中可找到大量用例，如《新出首楞严经》。

总而言之，“出”作为主要动词时，主语可为佛经或译经僧，主语为佛经时强调佛经的来源或产生；主语为译经僧时也表明佛经的来源，只是这种来源是抽象化的，并且常常伴随翻译行为，“出”也随之具有翻译的含义，但这并不是“出”的本义。^①“出”的宾语为佛经，

① 译经僧与“出”搭配的格式，实根植于佛教的叙述传统，详见下页。

既可以是泛指“经”，也可以是具体的经名，还可以是指代某部佛经的代词“之”。“出”既关联出经的来源和结果，也指出经的过程，还指“出”这一行为本身，并且可被不同副词修饰，进而变为更加细致的表达。

3. 动补结构中的“出”

“出”可与其他动词组合使用，如“宣出”“诵出”“演出”“抄出”等。太田辰夫认为此类结构是复合动词，他提到“出”可作趋向后助动词，“‘出’指的是和‘进’相反的方向，即向外部实施的动作。它最早是等立的复合动词后面的部分，但后来或是成为使成复合动词一类的东西，或是虚化了”^①。然而，他又指出，“单一的趋向后助动词的发达是在唐代”^②。王国桢认为先秦时期出现的“动词+出”是连动结构，到西汉时期，这种结构可视为动趋式结构。南北朝以后，“动词+出”才可理解为动补式。^③沈敏和郭珊珊指出“动词+出”在东汉时形成动补结构，而“出”表示从隐到显和从无到有的结果义已经形成，但直到唐代才完全成熟。^④结合各家看法，南北朝时期的“动词+出”结构可视为动补结构，但“出”的含义仍较为实在，与前一动词的结合也不甚紧密，例如：

(35) 乃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入。(《礼记·文王世子》)

(36) 狱中鬼神，**拔出**其舌。(支谦译《八师经》)

例(35)是两个动词连用，中间还可插入连词“而”，而例(36)中

①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② 同上书，第198页。

③ 参见王国桢《趋向问题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④ 参见沈敏、郭珊珊《汉语“出”类趋向补语的语法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拔出”是动补结构，结合紧密，“出”作为趋向补语或结果补语。以上讨论的启示在于，以下例子中的“译出”“翻出”等动补结构，“译”“翻”为主要动词，而“出”表达结果义：

(37) 其所译出，百余万言。(谢敷《安般守意经序》)

(38) 佛法东行，年代已远；梵经西至，流布渐多。旧来正典，并由翻出，近遭乱世，颇失原起。(法经《众经目录序》)

从单独使用“出”到使用动补结构来表达译经是一种关键的转变，这不仅意味着表达上更加精确，还潜在地对译经活动的神圣性进行祛魅。汉地僧人“出经”的表述蕴含了他们对译经的认知——一种具有传承性、正统性和神异性的活动^①，与关于佛陀现世、菩萨现世、原始佛经现世的表述构成了平行叙事，而“译出”“翻出”只是语言的转换活动，不再强调经典的产生，在这种转变中，对于译经的新的表述体系逐渐形成。在《出三藏记集》中，著录新译的佛经，一般使用“新出+佛经名”的格式；在《历代三宝记》的入藏录，著录佛经按大小乘的经律论分类，已译出称“有译”，阙译人译名称“失译”；《开元释教录》则广泛使用“新译”“重译”“新译”“后译”“合译”等表述^②；《大中祥符法宝录》和《景祐新修法宝录》则用“新译”，并且在每一卷所著录的佛经之前用“译经……译成”介绍译经情况，如：

(39) 三年十一月起，译经一部二十卷，至天圣元年四月译成

- ① 僧传中众多对来华译经僧之记忆出众、有神异的描述可印证这一点，如《高僧传》对佛陀耶舍的记载：“耶舍先诵《昙无德律》，伪司隶校尉姚爽请令出之，兴疑其遗谬，乃请耶舍，令诵羌籍药方可五万言，经二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众服其强记。”(CBETA 2023.Q1, T50, no. 2059, p.334b15-19)
- ② 《历代三宝记》对于已译佛经一般注解“时间/地点/译者+译出”。《开元释教录》的总括群经录部分著录有明确译人的佛经，一般使用“译人+译出”的表达。到了宋代，“出”的使用频率已经很低，官方编纂的《大中祥符法宝录》和《景祐新修法宝录》两本经录用“出”的只有百例左右，用“译成”居多，相比《出三藏记集》使用“出”有五百多次，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全部，并又译成经一部一卷。（《景祐新修法宝录·随译年代区别藏乘录中之五·归摄藏乘略明经旨一之五》）

从以上经录的著录中可以发现，从东汉至六朝“出”逐渐被“译”替代，这种变化，与汉传佛教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不无关系。^①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也随之开始，中期印度语、西域的某些语言的佛经被翻译为汉语，之后可能还经历抄写和勘定等流程，汉译佛经才真正诞生。随着译经活动的持续发展，同一部佛经可能被多次翻译，已经译出的佛经在流传中也可能被删改、重新编纂，所有这些行为均可视为佛经生成过程的一部分。针对佛经翻译的流程、方法、源语、佛经语言特色、译者、文献来源和经录等方面的讨论已有很多。^②早期来华的异域僧人不擅汉语，而汉地本土的佛教徒又不熟悉西域语言和梵语，因此佛典的翻译最初就采用了多人合作制，后来发展为译场制，“出”的多义性即与这种特殊的翻译方式有一定关系。早期来华的西域僧人支娄迦谶和安世高均译出了一部分佛典，到前秦时期，苻坚召请高僧道安组织了第一个官方译场，随后佛经的翻译大部分在译场中完成，隋唐时期译场已非常成熟，有明确的分工，如译主、笔受、证文、正义等。^③宋代赞宁所撰《宋高僧传》对译场的分工有详细的描述：

-
- ①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唐代以前请译经僧译经，一般用“令出”，如例（1）（7）；“请出”，如：登集京辇敏德名望，便于郡内请出此经。（道慈《胜鬘经序》）而唐代玄奘、义净译经，则用了“奉诏译”。
- ② 参见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张弓《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万金川《佛典汉译流程里“过渡性文本”的语文景观（第一部）——译经文体、译场组织与译经流程》，《正观杂志》2008年第44期；王邦维《语言、文本与文本的转换：关于古代佛经的翻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8卷第2期；〔日〕辛嶋静志《佛典语言及传承》，裴云青、吴蔚琳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范晶晶《何为源文本？谁是译者？如何界定译作？——从译场制度管窥佛经汉译的过程》，《国学学刊》2020年第2期。
- ③ 参见范晶晶《何为源文本？谁是译者？如何界定译作？——从译场制度管窥佛经汉译的过程》，《国学学刊》2020年第2期。

译场经馆，设官分职，不得闻乎？曰此务所司，先宗译主，即贵叶书之三藏，明练显密二教者充之。次则**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又谓为**缀文**也。次则**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次则**证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詮不差，所显无谬矣……至有立证梵义一员，乃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下不失梵义也。复立证禅义一员，沙门大通充之。次则**润文**一位，员数不恒，令通内外学者充之……次则**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詮之义也……次则**梵呗**，法筵肇启，梵呗前兴，用作先容，令生物善……次则**校勘**，讎对已译之文……次则**监护大使**……又置**正字字学**。^①

而实际上，译经的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并且早期的译经与宋代译经院中的译经情况又有不同。正由于译经、抄经等活动的复杂性，各种与言语、书写有关的动作动词也可以与“出”形成动补结构：

（40）麟嘉六年六月二十日，于龟兹国金华祠**演出**此经，译梵音为晋言。（佚名《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后记》）

（41）手执经本，诣白马寺对，与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佚名《正法华经后记》）

（42）太康七年三月十日，敦煌开士竺法护，在长安**说出**梵文授承远。（佚名《持心经后记》）

（43）太康七年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佚名《正法华经记》）

（44）沙门昙法护，于京师遇西国寂志**诵出**此经。经后尚有数品，其人忘失。（佚名《文殊师利净律经记》）

① [宋]赞宁：《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57页。

(45)沮渠亲面禀受，忆诵无滞，以宋孝建二年九月八日，于竹园精舍书出此经，至其月二十五日讫，尼慧浚为檀越。(佚名《治禅病秘要法后序》)

(46)至五月五日，沙门慧超起首再录，写出《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述经秘义。(不空《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

王向远指出，早期佛经翻译往往与宣讲、演讲同时进行，如竺法护、鸠摩罗什等，在讲经的同时就完成翻译^①，例(40)中“演出”之“演”即为敷演之义。例(41)中的“讲出”中的“讲”是指法护既讲且译，还是译毕而讲，目前不得而知。例(42)至例(44)的“说出”“宣出”“诵出”一方面反映六朝时期的所译佛经原典中有部分是由来华僧人口诵而出，并无纸本；另一方面，即使存在胡本或梵本，常常也需要胡僧或梵僧口诵、口译的方式宣读出来，这是“出经”必要的程序之一。^②若来华僧人汉语水平较高，一般身兼口诵和翻译原典的职能，既是译主也是度语；若汉语水平一般，便需要与汉人译经助手合作参详，助手也担任书写所译经典的职责，等同于后来的笔受或证义，而誊写经典的过程可用“书出”“写出”，如例(45)(46)。值得注意的是，例(46)中鉴于慧超通晓梵语，慧超所写出的也可能是原典而非译本，需要在具体语境中确定。综合来看，“动词+出”所关联的主语可能是译经过程中的不同角色，但一般而言，“言说动词+出”的主语一般是来华僧人，“书写动词+出”的主语一般是汉地佛教徒。“抄出”的使用则反映汉译佛典文本的流传：

① 参见王向远《佛典汉译“出经”及其概念功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② 《出三藏记集》所载经序存在许多“手执梵本”“手执胡本”的记载，证明六朝时期的译经所据佛经原典除来自来华僧人的记忆，也存在纸本。此处感谢北京大学范晶晶老师的提醒。

(47) 今所诵者，乃是后人准律抄出，且备时用（元照《删定比丘尼戒本序》）

(48) 佛去世后，从大品之中抄出小品。（支遁《大小品对比要抄序》）

除了直接翻译原典之外，汉译佛经中为数不少的异本其实是摄取多部佛经集为一部，或从全本抄录一部分而成，如以上两例。并且，抄经能带来功德，即使刊本藏经出现之后，抄写佛经仍然是最重要的佛经流传方式。若是汉地僧人撰写的注疏、义解，则用“撰出”：

(49) 菩萨习禅法中后更依持世经，益《十二因缘》一卷，《要解》二卷，别时撰出。（僧叡《关中出禅经序》）

总而言之，动补结构“动词+出”的使用，一方面是由于汉地佛教徒对于译经活动认识的深化、转变使用了更精确、更中性的表述，如“译出”；另一方面是由于译经过程的复杂性，表达口诵、讲演、翻译、誊写等行为的动词都可与“出”形成动补结构，“出”表达结果义，提示佛经从无到有的产生。

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语词使用与经典建构

上一节分析了“出”在佛典题记中的使用，提及“出”与经典生成的联系，本节要从另一方面证明，汉魏六朝“出”的高频使用，乃是汉地佛教徒有意为之，而此后“出”的使用衰落，也折射了佛教的发展轨迹。

1. “出”在题记之外：中土文献如何著录典籍

“出”本来是一个常用词，然而六朝时期佛典题记“出”的使用远远超出中土文献。中土文献中对于作品的著录，一般只注明题名和

作者，或根据作品体裁的不同使用，“撰”“注”“传”“作”“著”而不是“出”。例如，在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的《文选序》中，论及文本创作时是这样说的：

(50)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文选序》)

(51)骚人之文，自兹而作。(《文选序》)

(52)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诛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文选序》)

萧统所用，有“画”“造”“生”“作”等，当然也有“出”，只是，例(52)中“兴”与“出”对举，分别说明“箴”和“戒”这种文体产生的原因，而与单一文本的产生无关。另一例证为中土的目录学文献著录典籍时所用的体例。在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和魏征等人所编《隋书·经籍志》的体例均可分为著录和述要两部分，著录部分为存世典籍目录，述要部分为概括介绍所著录典籍的情况。著录的体例可举以下例子：

(53)《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汉书·艺文志》)

(54)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55)《周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梁六卷。(《隋书·经籍志》)

(56)《周易》五卷。汉荆州牧刘表章句。梁有汉荆州五业从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隋书·经籍志》)

(57)《周易并注音》七卷。秘书学士陆德明撰。(《隋书·经

籍志》)

(58)《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梁又有《国子讲易议》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易义疏》二十卷;《齐永明国学讲周易讲疏》二十六卷;又《周易义》三卷,沈林撰。亡。(《隋书·经籍志》)

以上例子中,对于典籍与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有多种表达,例(53)中,“施、孟、梁丘三家”是易学家,是传承《易经》者而非作者,此例没有用任何动词来表达这种联系;例(54)中,刘向为《五行传记》作者,此例也不用动词表达文本与人的关系。例(55)和例(56),题名虽为《周易》,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周易传”“周易章句”,“传”和“章句”既是一种体裁,也表达创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按现代语言理解,应是“为……作传”“为……作章句”。例(57)和例(58)中分别用“撰”和“讲”表达文本与人的关系。在《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著录部分中,不用“出”一词。述要部分大多也用其他动词来表述某人与某部作品的联系,如:

(59)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汉书·艺文志》)

(60)《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汉书·艺文志》)

(61)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书·艺文志》)

(62)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

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汉书·艺文志》）

（63）《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汉书·艺文志》）

（64）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隋书·经籍志》）

（65）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隋书·经籍志》）

（66）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

（67）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

（68）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隋书·经籍志》）

（69）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隋书·经籍志》）

（70）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隋书·经籍志》）

（71）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隋书·经籍志》）

(72)《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隋书·经籍志》)

(73)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隋书·经籍志》)

(74)《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隋书·经籍志》)

《艺文志》和《经籍志》所见与“创作”“生产”“翻译”文本有关的用例如上，几乎不用“出”，而用“作”“著”“为”“制”“造”“译”等，即使用“出”，也是用于表达文本出处，而非创作、翻译、生产，并且可使用“出”来形容的，基本都是儒家传统中最为神圣的经典：

(75)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上》)

(76)古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汉书·艺文志》)

(77)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汉书·艺文志》)

(78)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隋书·经籍志》)

(79)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隋书·经籍志》)

(80)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隋书·经籍志》)

(81)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书·经籍志》)

(82)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

(83)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于此。(《隋书·经籍志》)

乍一看，似乎中土文献中“出”的使用与佛典题记中的“出”有许多相似之处。“出”可搭配地点、时间状语，地点状语如例（75）至例（78）的“河”“洛”“孔子壁”“鲁淹中”“淹中”，时间状语如例（79）和例（80）的“齐、梁之间”“前汉”等。例（81）中，“间出”的用法也见于佛典题记，如前文例（28）。可是，细究起来，这些例子中的“出”恐怕理解为出现、显露更为恰当。首先，这些例子在叙述中都避免将文本之“出”与作者的创作联系在一起，只提及文本出现的时间地点，似乎只是为了追溯文本最早出现的源头，这一点与佛典题记中的“出”大为不同。例（81）至例（83）的“间出”“同出”“别出”中的“出”无疑是“出现”的含义。其次，这些例子中“出”的使用，无一与翻译有关，其实也反过来可以证明，佛典题记中的“出”本身并无翻译之义。例（75）至例（80）中“出”了的文本分别是《易》《尚书》《礼》，以及下例（84）的《孝经》，都属于儒家的五经，是经典中的经典，大部分没有作者，有一些即便有——如儒家相信《易》为周文王所编，《孝经》为孔子所作——这些作者也都是儒家所尊的“圣人”，不同于一般的作者。《经籍志》确有一例人名与“出”搭配的用例：

（84）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支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隋书·经籍志》）

“芝子贞出之”中“贞”指颜贞，为颜芝之子。这一例是《艺文志》和《经籍志》中唯一一例“出”与人名搭配的例子，然而根据上下文语

境，这里的“出”是“出示”之义，与创作、生产无关。综上所述，在中土文献中，至少在早期目录学文献中，“出”表示来源，含义解为“出现，出示”^①，并且“出”的对象必须是较为神圣、权威的典籍，如儒家五经。

2. 撰者选择与语境制约

从上一节所举的例子来看，“出”用在典籍著录中是有一定条件的，并不十分常用。那么，东汉至六朝佛典题记中为何频繁使用“出”呢？隋唐以后，为何“出”的使用又衰落了？一个“出”字的历史，其实折射了佛教传入汉地之后的发展历史。“出”的使用，至少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出”的使用受到中土著录传统的影响，恰恰是因“出”的使用受一定条件限制，佛典题记撰者选中了它来表述汉译佛经的产生，以强调佛经的神圣和权威。“出”的高频使用不太可能收到印度原典的影响。一方面，佛典题记为汉地僧人所撰，并不直接涉及翻译过程。另一方面，在古印度的叙述传统中，典籍通常来自神授，在表述时常常使用“讲述”“创造”等词语，如《舞论》开篇第一颂“向祖宗（梵天）和自在天（湿婆）两位大神鞠躬致敬，我现在开始讲述梵天阐明的舞论”中用udāhr“讲授，宣说”一词；第七颂“你们身心纯洁，凝思静虑，请听梵天怎样创造戏剧吠陀！”使用sambhava“创造，产生，出现，汇聚”一词。在义净《梵语千字文》和全真《唐梵文字》中“出”对译tikṣṇa，利言《梵语杂名》和僧怛多蘖多《唐梵两语双对集》中“出”音译为“𑖦𑖩𑖫𑖫”，拉丁转写为nikkara或tikṣṇa，词根可能为√tik“去”，与印度原典所使用的词不同，也即至少从辞书的记载来看，汉语的“出”不大可能对译于印度语言的“创作”“产生”等词。在汉文传统中，并非没有其他用于表述“创作”一类含义的词，如上一小节诸例，并且例（62）中《论语》的编纂实际与原始佛

① 这种含义的“出”另一显著特点是常常与介词“于”搭配使用：“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隋书·经籍志》）

经的结集非常相似，可是用语却不同。当然，译经僧本质上不是“作者”“撰者”，只是一个中间人、传承者，佛经真正的“创造者”，是佛陀和早期印度佛教的大师。然而，汉土也很早就使用“译”来表达“翻译”的含义：

（85）后三年则越裳氏重译而朝。（刘向《说苑·辨物》）

（86）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例（85）中的“重译”为辗转翻译之义，与佛典中的“重译”意义不同，但“译”表达翻译之义则显而易见。可见，如果汉地僧人要选取一个词描述佛经的翻译，“译”是非常合适的。那么，他们选择“出”而不是“译”，很有可能就是有意为之，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叙事逻辑，原本只能与汉地神圣经典搭配的“出”，也用于汉译佛经的出现，使五经与佛经处于类比的语境，达到使佛经经典化的目的。六朝时期的佛经题记的内容，大多是佛经写定之后对于译经目的、过程、时间、地点、参与人物的记述，是站在回顾的立场。之所以要记录某部佛经的翻译，是为了确保佛经的出处有据可依，以成信史。最早佛典题记中的“出”，也仅用于有明确译人、译名的汉译佛经，也只有经过“出经”，佛经才能被中国僧众接纳：

综合考察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出经”，可以看出“出经”往往需要一个较为正式而又隆重的场合和仪式，除了檀越（赞助人）往往具有国君、公卿大臣及地方太守等身份，属于一种国家行为之外，更重要的是，一部外来的佛典是否被中国的僧众认可为“经”，必须经过“出经”这样的程序与仪式。^①

^① 王向远：《佛典汉译“出经”及其概念功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52页。

汉地的“疑经伪撰”是不可用“出”的，无译人译名的佛经，即使内容很可能是从印度原典翻译而来，也只能以“失译佛经”称之。

佛典题记的属性决定了其内容的书写必然是要强调某部佛经的权威性和优越性，而汉魏六朝时期强调得最为明显，一方面与当时注重佛经供养，流行“三宝崇拜”^①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这种把佛经翻译与太平盛世相联系的修辞策略，也有利于佛教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壮大：

承周武帝灭佛之后，佛经被焚毁，经籍多残破。隋文帝甫一登基，就从西域、内地都搜求了不少的梵文经本，开皇元年即命令相关官员征召译者，二年建立译场开始翻译。在佛教的叙事中，这一潮流几乎被看做是具有河图洛书般的神圣性。……异域僧人来华、外国经本东传、开设译场广纳知识，都被认为是天象感应、政权合法、文教兴盛的明证。^②

在六朝佛教鼎盛的情况下，佛经翻译被赋予了象征祥瑞的意义，体现在叙事策略上，除了使用带有神圣意味的“出”，还有将梵书称为“天书”，将“梵语”称为“天语”等。^③到隋唐和宋代，佛经翻译仍然是统治政权宣传自身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但在大一统的稳固环境中，这种手段的有效性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唐代和宋代的译经由官方设立译场，指派儒臣参译，译经僧也可受统治者敕封俗职，受赐紫衣，这固然是翻译事业发展成熟的表现，同时也反映译经活动已经被政权把控，佛经的合法性由官方决定，不再通过自我声明的方式表达。并且，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佛教文献已经被纳入中国传统的文献系

① 参见方广钊《关于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姜亮夫、郭在贻等编纂：《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470—489页。

② 范晶晶：《再论从“胡”到“梵”——隋唐佛教译经用语的变迁与华夷一统》，《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第49—50页。

③ 同上。另“佛教中的天书观念”可参见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台湾），2010年，第78—87页。

统，需要按照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目录学体系来著录，而佛经相比五经，在地位上是有差别的，简言之，佛经逐渐失去了使用“出”的资格，这也是从六朝到唐代“出”的使用急剧下降的原因。

其次，“出”作为常用动词，无论表方向的本义，还是表“出生”“出现”等引申义，对于可搭配的主语和宾语类型几乎没有限制，因而佛、法、僧三宝都可用“出”来表述，形成平行叙述。不管在佛典题记中，还是在佛经中，关于佛、僧出世的描述非常常见：

(87)自我师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后说。
(僧祐《出三藏记集序》)

(88)诸佛出世应物随形，志求者智镜玄通、念之者无幽不入，根缘感赴必借此经。(不空《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

(89)佛灭度后五百余年，有马鸣菩萨出兴于世。(复礼《新译大乘起信论序》)

(90)灵迹稍启，名僧间出。(沈约《佛记序》)

(91)一切佛世尊出世。……如来所出语，皆令众生生爱乐心。
(真谛译《部执异论》)

(92)复次若阿罗汉出现世间，天人充满恶趣减少，如有德王出现于世，是故偏说。(《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41)

在例(87)至例(92)中，佛、菩萨、僧的出现均使用“出”，与佛经出现的表述是类似的，而佛经的特殊性在于，佛经首先出自佛陀，迨及佛陀灭度后，五百弟子第一次结集，阿难出经和论藏、优波离出律藏，此后佛经又经入汉僧人传至中国，所以佛经的“出”，可以有三层表达：佛出，优波离、阿难出，译经僧出：

(93)昔在佛世经法未记。言出尊口弟子诵习。(严浮调《沙

弥十慧章句序》)

(94) 然则经无巨细出自佛口，神心所制言为世宝。(道安《十二门经序》)

(95) 先令优波离出律藏。一一事竟……后方命阿难出修多罗藏及阿毗昙藏。(僧祐《出三藏记集·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

例(93)至例(95)的“出”分别表达佛经出自佛和阿难、优波离，“出经”在此处指原始佛经的生成，王向远也指出了这一点，其文引用以下两例：

(96) 阿难出经，去佛未久(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97) 阿难出经，面呈圣旨，五百应具，更互定察，分为十二部，于四十九年之诲，无片言遗矣，又抄十二部为四阿含，阿毗昙、鼻奈耶，则三藏备也。天竺学士罔弗遵焉，为坠于地也。(道安《鼻奈耶序》)

因此，佛典题记中“出”与文本生产之间的关联，有可能是受到汉译佛经中此类叙述方式的启发，并且动补结构“动词+出”在一些语境中可找到相似的影子：

(98) 于是世尊化为两身，一曰何等、一尊主，演于斯义出矣。(康僧会《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序》)

(99) 又诸佛出世尽说三藏，所谓修多罗、毗尼、阿毗昙。(北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毗昙毗婆沙论》卷1)

(100) 又大迦叶召千罗汉结集法藏，阿难从锁须入，诵出佛经一无遗漏。(元楷《佛说陀罗尼集经翻译序》)

以上三例中的“演”“说”“诵”等，也都在题记描述佛经翻译时使用，这些例子的相似性恐怕不是巧合。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101）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佚名《首楞严后记》）

张天锡是前凉第九位君主，并非译经僧，即使参与佛经翻译，很有可能也只负责润文，为何“出经”的人变成了他，而不是译经僧？可以推测，张天锡作为地方统治者，很有可能也是译场的赞助者，享有对佛经生产的决定权，因而也是可用“出”来表述的。

3. 小结

在中土文献中，著录典籍的创作者一般使用“作”“撰”“著”等词，“出”一般只用于描述五经的出现，隐含一定的神圣义，因此佛典题记的撰者选中这个词来表述汉译佛经的产生，给汉译佛经的出现赋予了神圣色彩。另外，“出”可用于表述佛、僧、法三宝的出世，还可用于表达原始佛经的生成，题记使用“出”来表示译经僧“出经”的活动，也可能受到佛教本身叙事逻辑的启发。撰者的选择与语境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出”在佛典题记中的使用比在中土文献中高，庶乎可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来形容。随着译经活动的官方化，佛经的合法性完全由官方设立的译场确认，所有翻译的佛经都有史可征，在经录中一般使用“译”“译出”来表述。由于佛经被纳入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传统文献系统，从儒家的角度看，佛经的地位并不能与五经相提并论，渐渐失去了使用“出”的资格，造成隋唐以后“出”使用频次的急剧下降。

结 论

早期佛典题记是研究汉译佛典的时代、来源、翻译情况的第一手

资料，对探讨佛教传入汉地的早期传播史和接受史有重要的价值。自东汉至宋代，“出”一直是一个常用词，在佛典题记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其中，东汉至六朝“出”的使用频率最高，并且大部分用例主要与经典的产生有关。此后随时代的变迁，“出”的总体使用频率逐渐降低，与经典产生相关的用例比例也在减少。“出”可作为主要动词，搭配的主语可为泛指佛经或特定佛经题名，也可为译经僧，甚至可以是赞助译场的檀越；搭配的宾语则一般为佛经；“出”的前后可出现时间状语和地点状语，指示出经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时间没有精确到日，“出”可能表达整个译经活动结束的时间；“出”可受“更”“重”“新”等副词修饰，指示经书的版本。“出”可与言说义和书写义动词组成“动词+出”式的动补结构，如“诵出”“译出”“抄出”等，其中动词代表译经的环节，而“出”表示结果义。综合来看，“出”的意义并不是翻译，而是强调佛经的产生。

语词的使用有其特定的语境，往小了说，语境可以是句子的上下文，段落主题、篇章的主旨，文本的体裁；往大了说，语境是一时一地的语言使用传统。语词的使用也决定于个人的选择。“出”的使用是受到汉地已有的撰述传统和佛教本身叙事策略的影响，促使题记撰者在有限的选择中选定了“出”来表达佛经的翻译与诞生。然而，时移世易，东汉至六朝时“出”的使用频率很高，到了隋唐和宋代却急剧降低，导致“出”的使用情况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汉传佛教自身的发展，译经事业发生了变化，对经典的认知有所不同，关于经典生成的书写也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社会、历史、政治背景的变迁也影响了语言的使用。有趣的是，在“出”的使用衰落的同时，词义与之相反的“入”进入著录的表述体系——“入藏”与“出经”使用的是类似的策略，都是叙述一种权威与地位。经录也许可以看作是原始的入藏录，“出”使用的衰落，或许也与入藏录的诞生有关，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